

名家访谈

报告文学应从心出发

最好的作家既能雄浑大气，如鲲鹏在天之高，又能柔情似水，沉入人间万家灯火

刘 浏：谈及您的报告文学创作，至少有两个题材是绕不开的，一是火箭军，一是西藏。44年军旅生涯，“导弹三部曲”（《大国长剑》《乌瞰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）是中国报告文学军队叙事、国家叙事、重大工程叙事的代表作；35年间21次进藏，“西藏八部”（《麦克马洪线》《东方哈达》《雪域飞虹》《坛城》《玛吉阿米》《灵山》《经幡》《金青稞》）深入走进西藏，让无数读者看到了真实、丰富、深刻的西藏。您这两类题材的创作经历是如何的？您是怎样看待报告文学的题材与写作的？



徐 剑

徐 剑：我觉得你对我创作的阅读是非常精准和到位的。你提出来的导弹系列的大国叙事和西藏系列的民族风情叙事，实际上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的“我有双翼”——即两只文学的翅膀，一只就是我自16岁以来投笔从戎即已开始的，以导弹火箭事业为主体的大国长剑和大国重器书写，这是铁马秋风大散关、无定河边埋忠骨的文学叙事，这种中国式书写是以司马迁为源头的；另一只翅膀就是西藏，让这一代作家、大学教育和文学训练是有缺失的，因此需要补课。从发蒙到获得所谓的创作灵感，呈现一闻千悟的文学禀赋，最好还是能和天地人感应，使个人经历与后天所学（历史、哲学、宗教等等）打通。如果是一个作家既有金戈铁马般的宏阔大气，同时又具民族风情和宗教的温婉与纯净，还能兼擅千秋史笔和文学塑形，则精神深度、广度，及其信度、锐度也能得到充分拓展，并在创作中真正做到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。所以我很庆幸，在我进入作家序列的时候，我便有了这种经历。这样的经历使我很早就认识到了，报告文学的书写，永远不能离开生动丰沃的历史场域，真实的人类情感，以及复杂多义的现实世界。

好的作家来说，题材才重要。这就提醒报告文学作家，要反思题材与写作的关系，毋庸置疑，作家的重要性，写作的重要性，先于一切题材和艺术。总而言之，好作家能看到时代脱离、地域阻隔这类题材当中的内在关联性，并把它们串接起来，成为彼此映照，相互交织的时空维度、心理维度、文化维度，优秀作家本应如此。

文心和元气离不开写国之大事，离不开写民族魂，离不开写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，离不开写新时代

刘 浏：近年来，您特别倡导“守望中国文学的文心与元气”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坚定的态度？您认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从何处汲取哪些养分以及该如何做？

徐 剑：在2022年3月26日我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之后的一次发言中，我特意讲到了文心和元气。文心，就是初心。它是最早萌发的情志意念，也是“中有太古声”的精神气象、思想泉流，如果沿波讨源，则我们上可接太史公根脉，以其磅礴充沛的历史见识、文学知性和人生境界为标杆，让自己的内心激荡亘古豪情。自然，眼下最紧迫的任务，还是回到当下，沉下心来研究民众生活，接受并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；至于更高层次的期许，则是回归古典心意，回归高贵与纯净，回归中国化叙事，回归以人性为圆心，回归真性情，毫不动摇地坚持写出中国气派。我以这样的概念和文学彼此接引，实际上也是抱着一种很强烈的愿望，想让我们的报告文学，让这个时代第一次，能够淋漓洗秋碧，能够拨除人心，令更多蒙昧者可以闻闻弦诵之音，让报告文学作家能够真正负起推动新质文化建设的重任。但目前情况不甚理想，还有一些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。比如报告文学的文心始于何处？报告文学的第一口气和第一次的内心悸动为谁触发？报告文学为谁而写？这些至今还在困扰许多人，都是需要认真思考、对待、解决的。

有人把报告文学看作一种舶来品，我部分同意这种观点。但说到我们的报告文学起于何时，我的观点可能别人不太会赞成，但我还是坚持我们的报告文学始于《诗经》，始于秦风、魏风、燕风，风雅颂的风，那才是最好的报告文学。集报告文学之大成者，当然是一代史官司马迁，太史公写的报告文学是元气和文心最初的原点与巅峰。我觉得，报告文学的坐标就是《史记》的坐标，再远一点，就是《周南》《秦风》《卫风》《魏风》《郑风》的坐标，就是为百姓而歌、为百姓而哭，虽颂犹刺。要将文学的焦点、落点、着力点，对准老百姓的喜乐忧愁，酸甜苦辣。这也是一种文心和元气，所以，我们讲文心和元气就离不开写国之大事，离不开写民族魂，离不开写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，离不开写新时代。其实，一个民族能走多远，最后比拼的不是孔武之力，不是经济，而是文化与精神。

刘 浏：报告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向真实逼近的过程。您的“三不写”原则——“走不到的地方不写，看不到的地方不写，听不到的地方不写”将“追求真实”摆在创作最醒目的位置。然而，我们都知道，绝对的真实根本不存在，只有相对的真实。您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要讲真话的？

徐 剑：我这个“三不写”是在九次作代会提出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说真话、写真文、表达“真善美”必不可少的一环。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很深刻的，实际上，我们很多作家都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面写作，很多人都觉得我的生活、我的感受、我的采访是真实的。我非常赞成你的意见：所有的叙事和所有的真实，都是被虚构了的，或者说被叙事了的。比如当我们面对一个采访对象时，他其实已经在对所发生的故事细节和人生重新进行叙事，这种叙事会让我们的真实性打一个问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强调一本书的采访，如果不记录五到六个采访本，我是不敢轻易着手的。比如，一件已发生的事会有N个版本，我们只有把所有采访对象都采访完了，把各个版本放在一起综合分析，才可能不会“上当”，才不至于被虚构的或者人为夸大的修辞所迷惑，从而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。

“说真话”很难。那种要大家用仰视的目光以示毕恭毕敬的做法，对报告文学而言，就是一场灾难。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不说真话，那就是昧着良心写作，就是背离公文，就是虚假陈辞。所以，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写一本书，没有三个月到半年的采访、没有把所有的当事人谈完，我是不动笔的。当然，“说真话”也是付出代价的，尤其是涉及负面、涉及社会形象等的书写，如果不说真话，没有像法官搜找、采纳证据一样全面了解情况，那么写出来不就是笑话吗？这样就是坐上了审判长席位，也同样是罪嫌。

“说真话”的作品才会是久长的作品。比如司马迁对刘邦的书写，既写了他的政治抱负，也写了他的性格弱点，再比如对李广的书写，既说出了他的长，也说了他的短。我认为说真话，特别是在大题材的把握上，一一定是辩证的，有长就有短，有阴就有阳，有对就有错，有成绩就会有缺点，我们应该把这些阴阳、对错、长短、善恶的东西写出来。

我们的书写一定要有纵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，在敏锐的发掘背后要有深沉的哲学眼光

刘 浏：“为何而叙”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格外重要，这一点区别于其他文体创作。比如，1977年9月18日，中共中央发

徐 剑 刘 浏

出《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》。10月《人民文学》的选题跟科学挂上了钩，编辑觉得，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。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应运而生，作品发表不久之后，全国科学大会召开，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，陈景润、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。作为“科学的春天”的颂唱，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创作初衷和目的呼应起来。您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“为何而作”的？

徐 剑：“为谁而作”的问题，涉及到的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为谁而写的问题。你用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说了出来，肯定是要为人民书写，为苍生书写。横渠四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，就是要求我们要有预见性，能预见新生事物的未来，而且要有宏观的历史性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书写一定要有纵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，在敏锐的发掘背后要有深沉的哲学眼光。你讲到了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它是徐迟老先生的巅峰之作，也是当代报告文学的顶峰之作。迄今为止，我觉得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达到徐迟先生的那种高度——不仅仅是“洛阳纸贵”，而是真正的内心高贵。当年陪同徐迟先生采访的编辑周明老师给我讲了许多他采访的故事。在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之前，徐迟已经写过一些报告文学，但是都没有达到像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这样的高度。当《人民文学》找到徐迟，对他说又抓到一个“书呆子”陈景润，徐迟马上兴奋了起来，调动了自己一生所学，就是我才所说的文心与元气，把自己的浑身力量都使了出来，旗帜鲜明地为知识分子而歌，这样才达到了那样的写作高度、广度和深度。

刘 浏：报告文学作家具备“多合一”的身份，是采访者、叙事者、知识分子，也是行动派、逆行者、时代的记录员……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好这多重身份的？

徐 剑：你说“多合一”的身份，其实就是我很多年前提到的报告文学作家“五个半”合体，即半个社会活动家、半个思想家、半个历史学家、半个杂家、半个文学家。“五个半”合成了一个田野调查学者、一个时代书记员、一个春秋太史公……你把逆行者特别提了出来，我觉得很重要。这种“多合一”的身份，其实就注定了中国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纯粹的知识分子写作。这种写作不仅要能够枯坐守望中国文学的文心、元气，还要敢说真话，敢写、善写真事，愿付真情。所以，它不容易。但是，它极看重中国读书人的良知和脸面，所以，它又是可敬的。

乍看之下，报告文学的入门门槛很低，好像什么人都可以是手，但那其实是一种假象，真正写得好的一定是风毛麟角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这支一线的报告文学队伍，除了个别“70后”成长起来了，仍然是“50后”“60后”在唱大戏，这就是由于多重身份没有兼顾好所导致的。在我们谈话之始，我就强调了人的经历的重要性。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，没有经历是根本写不出人间百态、人情冷暖、人生沉浮、尘世烟火。

报告文学作家首先是一个采访者，或者是社会活动家，要和各种人进行对话、打交道。还要在采访之前做好充分准备。其次，报告文学作家是叙事者，也就是文学书写的作者，要有能容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乃至考古、科学笔记为一体的跨文体叙事武艺。再说及报告文学家之知识分子的特点，那就是铁肩担道义——为民而歌，为民而作，为民而忧，为民而哭。行动派的身份就更不用说了，其实我前面讲的“三不写”其实就是一个佐证，比如我前几年写南海填岛的《天蓝海阔》，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采访，四下海南，所有主要角色、次要角色都采访到，才敢着笔去写。我特别赞成你说的逆行者身份，这个提法非常好。所谓逆行，很有可能是抛开大家都以为是共识的事件逆行、与一定群体的利益相对撞逆行，这就意味着自己注定会成为牺牲者、会要付出代价，稿件可能会难见天日，甚至被付之一炬。当然世界能记住的，恰恰就是您的逆行，而逆行留下的文字最后或会成为不朽。还有一个，就是你说到的时代的记录者，即书记官。很多人就讲，司马迁的书写是一种虚构。我说，错。司马迁兼有多重身份，作为采访者，他从小跟他父亲在国家档案馆、图书馆里看史料时，已经在做收集与积累了；作为叙事者，他又习得《战国策》《左传》等史家叙事的文学技巧；作为知识分子，他敢写刘氏王朝、敢写刘邦的泼皮无赖，敢写恶者、兵者、商贾、阴谋家，并且将贤者、法家、儒家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刘 浏：报告文学作家应该也是艺术家。报告文学创作不是单纯的记录，或是纯粹的叙事，报告文学首先是文学，是具有鲜明文学性与审美价值的文体。您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审美追求的？

徐 剑：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家，也应该是艺术家。我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后，便同大家商量，我们主办的评奖一定要评出权威性、学术性、引领性、艺术性。其中，艺术性关联文学性。最好的报告文学作家既应是最纯正的知识分子、写作者，又应是最纯正的文学叙事的艺术家，而不能仅是记录、单是报告，也不能单是纯叙事。具体说来，就不能是空泛的数据罗列、冰冷的过程介绍、“只有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的材料汇报，而应有鲜明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。

报告文学文体本应就是集大成者，可以让所有文体为我所用。我的《东方哈达》是43岁前后写的，是一部中年变法的作品，这部作品让我深刻意识到了文体的审美价值。比如结构，很多报告文学作家没有结构意识。其实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把小说的结构、散文的抒情、诗歌的诗意、科学的严谨等都为我所用。

至今我都非常怀念在鲁迅文学院四个多月的学习，“鲁三”让我从中年作家的恐慌感里彻底跳脱出来。在拿了鲁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后，那段学习经历让我对报告文学的审美价值、文学性、思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也设定了更高目标：追求报告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。也就是使作品文采斐然，趋近古典，却浮再着人间烟火，这是我的一个理想。报告文学，就是要文得斑斓，写得耀眼，不是华而不实，而是文质皆美，星斗其文。

刘 浏：报告文学之所以仍然能成为中国文学重要文体之一，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就是因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坚守着三个坐标——面向时代、集体写作、知识分子责任与担当，这是报告文学创作动力的来源。我们看到，报告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，从缺席过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刻。同时，我们也能看到，一些作品在过分追求效率的情况下创作失重了，完全依赖材料和文献、语言表达枯燥直白，使得本来主

题很好的作品得不到好的文学评价。您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的？

徐 剑：这个问题是我非常看重的。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学当中，其重要程度大家可能低估了。所以你这个判断是回归了常识，回到了本质。中国作家协会17个学会，其中报告文学学会应该是时代精神的孵化器，因为它肩负着国家书写的使命，就是面向时代、面向国家、面向社会、面向全体。报告文学也必须和时代同频共振，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、任何一场历史灾难、任何一项国家重大工程、任何一个民族奔小康和共同富裕之路等等重大的历史时刻，报告文学作家都必须在场，这是我们的起码责任。

确实在我们当下的写作中，有大量的作品创作失重了。有的作品虽然拿了奖，但是就其作品的文学性、艺术性、审美性来说，就其作家的责任和担当来说，让人不敢恭维。我这里所说的担当，不单是拿着重大题材负责完成写作任务的担当，更重要的是文学上的担当，即不能拿得出配得上这个时代的皇皇大作，与时代同频共振、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书写相称的作品的担当。

再说有些作品完全依赖材料和文献，这也是要注意的。我想讲一个自己的故事。《金青稞》的采访写作，是我完成《天晓——1921》后进入的，领受写作任务时，我正处于带状疱疹刚恢复不久的特殊阶段。我开始采访前，西藏自治区扶贫办给我发了150万字材料，我把所有材料看完后，基本没得到几条线索，所有的线索和采访都得自己到现场去，靠自己独立的立场、独立的眼光、独立的发现和独立的解释。我没有用二手材料，我觉得二手材料对于我来说，只是一个背景，一个线索。至于语言表达的枯燥直白，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是存在的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，要从《诗经》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《左传》开始，要回到中国史传文学、报告文学的初心和原点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是很难成为司马迁这样的大作家的，也无法完成国家、民族、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。

刘 浏：从日常观察来看，报告文学的读者受众中青年群体并不大，更别提少年儿童了。您是如何看待读者与作家的关系的？您认为中国报告文学可以在创作与传播等方面做些什么？

徐 剑：有关报告文学涉及受众群体这样的观点，我并不完全赞成，至少说这种判断并不全面。我认为，好的报告文学作品，无论是题材、文学性、结构、语言、细节等等都非常好的文本，应是老少妇孺皆宜的。其实我有几个文本，比如说《东方哈达》拥有很多青年读者；《大国重器》有很多年轻的军事迷喜欢；还有《天晓——1921》，我也收到了很多青年读者的来信，他们告诉我这部作品把伟人、牺牲者、背叛者都拉到人的视角去写，让他们对党史题材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。当然，我没有什么值得自满和骄傲的，那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程和阶段。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今后如何更好地让报告文学走向青年、走向儿童。其实有很多题材可以写成少儿作品，用儿童的口吻、借助儿童的欣赏媒介来扩大它的传播。在读者和作者之间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视读者为上帝，不管读者是什么年龄段的，一定要了解他们喜欢什么、想读什么，要特别注意他们的阅读诉求。如此，只要确保守住文心、元气，强化报告文学的审美，让报告文学真正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文体，融百家之长为我所用，同时，又能让报告文学写作成为一个跨文体的写作，注意培养新人，那么，我相信，报告文学的未来，一定是值得期待的。另外，在创作方面，好的题材要把故事书写做实、做全、做好、做深、做独特；在传播方面，可以搭载包括有声书、网络书等各种媒介载体，以及在电视剧、电影方向上尝试成果的影视转化，那么，报告文学的路肯定会越走越宽广。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会长何建明做得很出色，他已经有两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我也有一两部在改编。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，我们想通过徐迟报告文学奖和秋白文学奖来鼓励新生代、鼓励年轻的作家，让他们尽快地进入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方阵，承担起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，完成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时代书写任务，不辱先贤，真正创作出巅峰之作和高峰之作。



本报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合办